

新主流影视的审美突围与价值突破

□ 周思明

近年来,新主流影视创作异军突起,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冲击力,凸现了一定的美学高度与思考深度,呈现了一股令人欣喜的“刷屏”态势。新主流影视是对主旋律的弘扬,但它们不再是既往那种单向度的主题强化,而是同时兼顾艺术价值的探索和商业元素的开掘,使之既有社会价值又有市场效益。正是这种创作实践,推动了更符合新时代观众审美需求的文艺创新,从而实现了影视创作审美突围与价值突破。

新主流影视作品具有突出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特征,原创是新主流影视臻达精品的基本前提,创新是新主流影视恒久不变的追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观众期待影视艺术家们能够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感人的形象创作出更多优秀影视作品,而新主流影视创作者正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大力创新,才适应了受众的观赏需求。创新是在继承传统艺术本质属性的基础上,根据新时代变化了的受众审美需求,进行必要的改革和新颖的独创。新主流影视创作是一种突破了传统边界,融合各种现代艺术形式的产物,是由观念、情感、审美意识与具象、意象、情节等叠加而形成的创意佳构,具有润物无声、成风

化人的神奇力量。其中,思想性是其筋骨,艺术性是其血肉,观赏性是其肌理。只有筋骨遒劲,血肉丰满,肌理细腻,方为艺术之上品。新主流影视创作彰显了创作者特有的睿智,生动形象的表述,营造润物无声的审美艺术气场,并用这个强大的气场来感染观众。

新主流影视之所以广受欢迎,其奥秘就在于创作者躬身践行影视工业美学原则。新主流影视培养和历练出了一批符合普通观众尤其年轻观众消费愿望的创作者。诚然,古典艺术、古典美学中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阳春白雪之美,也是部分传统观众所需要的。但是,新时代更需要有像新主流影视这样雅俗共赏的艺术佳构。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深度融合的不断加深,中国影视工业走向世界已成为必然和必须。在此过程中,具有美学新质的新主流影视无疑是中国影视业做强做大的战略创新。这一新型创作思路和实践,必将大大推动更符合时代、时代和市场需求的国产影视工业的繁荣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要求文艺创作要运用美学的、历史的原则,创作出具有较大思想深度的历史内容和莎士比亚化戏剧情节的生动性作品。广大

文艺工作者应该用美学的、历史的、艺术的、人民的观点,创作生产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统一,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既能在思想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的文艺精品。新主流影视创作正是遵循上述原则所进行的有效艺术实践,其坚决抵制无底线的“戏说历史”,无节制的“歪曲历史”,无节制的“重估历史”,主张以严肃的、活泼的、新颖的、创新的内容和形式刷新作品面目。比如,徐克导演的影片《智取威虎山》,不仅价值观、历史观积极正确,同时也融合了战斗片、悬疑片、黑帮片等多种类型元素,因而颇具吸引力。而《觉醒年代》《功勋》《人世间》等新主流影视精品,将个体人生与国家民族故事有机结合,将中国社会各领域中“普通人”的故事镶嵌进国家发展历史洪流中,生动诠释了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呈现了人民创造历史的朴素真理。

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是新主流影视的突出特征。无论是表现历史人物,还是表现普通民众;无论是表现战争时期的作品,还是表现和平时代的作品,新主流影视都依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回答人民群众的社会关切,以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生老病

死、柴米油盐的生活为已任。所具有的审美思想共同点是对世相刻画的真实生动,对人性刻画的鞭辟入里,对人心体察的细致深入,进而凸显出对生命的尊重。比如《我不是药神》《人民的的名义》《山海情》等影视作品,就具有突出的现实主义精神。可以说,现实主义精神是新主流影视创作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是它们能够穿越时空传递人类文化薪火的力量保障。

新主流影视不仅掀起了视听热潮,同时也推动了文化实体经济,所产生的眼球效应、符号价值与思想启迪,对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及国家文化海外推广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高兴地看到,以《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觉醒年代》《功勋》《人世间》等为代表的一批新主流影视创作,极大地带动了国产影视剧的质量提升,迎来了国产影视创作的新时代。可见,新一代编、导、演力量正在遵循或建构着一种新的影视工业美学,践行着视听艺术工业美学的核心思想,即在新的影视产业观念统领下,高度重视影视艺术规律和新时代观众的文化需求,既服从影视工业化生产机制,又合理表达影视艺术与消费市场的诉求,在思想、艺术和商业间寻找某种平衡的创作机制。

数字化冲击下传统期刊人的坚守与突围

——评郗元平长篇小说《穿左门走直道》

□任蓉华

一份优秀报刊的背后,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媒体人在负重前行。知名作家郗元平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穿左门走直道》(作家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讲述了数字化冲击下传统期刊《侠世界》由鼎盛转向衰败,然后在一群敢想敢为的期刊人不懈奋斗中,坚守本业、处变求变、走出困境的动人故事。

郗元平深耕传统期刊行业三十余年,有着深厚的从业经验和感受,或许正因如此,才使他塑造了龙昆仑、王道、江一石、杨柳等一系列个性鲜明的期刊人形象,用合情合理的情节编织期刊人的爱恨悲喜,再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传统期刊业的发展剪影。小说故事跌宕起伏,其中既有错综复杂的市场竞争,也有职场倾轧的尔虞我诈,以及团队、个人所面临的艰难抉择,时而剑拔弩张、如至绝境,时而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该书名字中的“门”和“道”,指的不仅是职场之门、涅槃之道,更代表了一种职场理念和人生信念。

“霸气”是龙昆仑身上的标签,他视亲情、友情如纸一般薄,将一切都倾注于工作。作为掌门人,龙昆仑赶走了阻碍期刊社发展的旧势力,提拔了一批年轻有为的生力军,使社内面貌焕然一新,造就了《侠世界》的辉煌。然而,无节制的成功也使他形成了固执己见、刚愎自用的作风,网络浪潮席卷之下,他拒绝改变,甚至做出了社内“禁网”的荒唐举动,并滥用权力打压异己。正是因为他思想上的僵化,不再契合团队发展,最终使其几乎陷于众叛亲离的境地。与之相对的,是圆融的王道,虽然入社较晚,但王道善于变通,懂得顾全大局,对身边同事常怀一颗宽容之心,以更灵活的工作方式维护期刊社的利益,在诚信和良善的底色下

顺应时代潮流。“野心勃勃”的杨柳、“执拗”的江一石与王道既是同事也是大学同学,曾因市场理念、为人处事观念不同,而逐渐产生了隔阂以至于形同陌路。后来,当期刊社走向衰落之际,他们又各怀鬼胎地集结到了一起,联合抵制龙昆仑,努力把《侠世界》从泥潭的边缘拉了回来,并渐入佳境……

高歌猛进时的“一身转战三千里”,数字化冲击下的“拔剑四顾心茫然”,艰难转型时的“不畏浮云遮望眼”……小说在重叠交织的人物关系中,展示了复杂的社会现实。作为同一个团队的成员,他们既惺惺相惜,也工于心计;既胸怀大志,也投鼠忌器。然而,内心的笃定,让他们绝不轻言放弃,在不断地上下求索中,迸发智慧火花,留下奋斗脚印。见微知著,解剖宏大主题之外,传统期刊人几十年的风雨沉浮,在小说中得以呈现,有艰辛,有心酸,也有温暖。

道可道,非常道。商无常道,穿过“左门”应走哪条道?小说最后,王道接替龙昆仑成为期刊社的新一任掌门人。对此,龙昆仑写下了“穿过左门走直道”的赠语,王道却将“右”改为“直”,一字之别,折射出不同的价值追求与人格人格,也成为决定他们人生意义的水火岭。

时代推动了传统期刊的转型进程,同时也改变了一些期刊人的人生走向。《穿左门走直道》即是对这段历程的真实记录,热血辉煌也好,艰难抗争也罢,都在命运的一个个“沸点”中升腾,化作对时代的深刻思考,诚如传统期刊人邱牧笛所言:“小说像是在写我们人生中一段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我们是亲历者、观察者。换句话说,我们不是书中的人物,但我们是和他们生活在一处的。不是‘他者’,而是真的我们。”

魏晋玄学视角下的《论语》研究

张凭、沈居士、顾欢、太史叔明。这便是今人所能见到的、代表玄学盛时影响的《论语》注基本面貌。王云飞在书中全面探讨了“十二家”《论语》注残篇,完整展现了玄学盛行时段《论语》注情况。

此书分上、下篇论述,上篇两章十二节,分别对应研讨“十二家”残篇文本;下篇三章,尝试引申探讨三个相关问题。本书重心放在上篇,对“十二家”文本进行分类、溯源与解读:一方面,作者以玄学关键词为标识,将每家注释内容进行分类探讨,凸显其特有的玄学特色;另一方面,在每家的具体探讨中纵向以汉魏六朝其他注家的不同注释,横向比较,展现各家注释的继承与创见。经此一翻一番横分析,读者得以全面领略玄学思潮如何在话语与思维上影响当时的《论语》注释。

此书分析深入而详尽。除开王弼、郭象和李充,“十二家”中大部分材料未见专门研究,故此书对其他各家的研究,开创之功自不待言。而更为难得的是,即便是首次论述,作者又能以其深厚的思想史积累,探骊索隐,将各家研究推进到可观的深层。书中,作者详细探讨了西晋传播的《论语》注,廖播之注仅存十四卷,材料有限,却在词语使用上体现出明显的玄学特色。作者抓住廖播使用的“崇本弃末”“理”“极”等玄学关键词,将这些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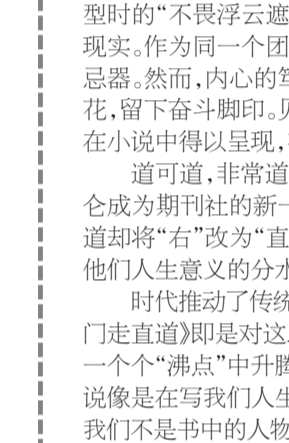
进行分类,进而分析其所内含的本末思想。在具体分析之中,作者一方面从玄学思想史角度,将其本末思想与王弼、郭象对照关联,揭示其中的影响与继承;另一方面又从《论语》学视角,将其具体分析解与郑玄、王弼、皇侃等相关说法进行比较,彰明异同,凸显廖播解释的独到之处。有限的残篇文段被置于宏大的思想史背景之下,生发出丰富的意涵。这样的研究就不仅仅停留在材料整理与基础解读,而进一步在思想史脉络中为廖播确定了位置,突出了其独有的理论价值。在其他首次研究的廖协、孙绰、殷仲堪等《论语》注中,作者这一论述特色均可见到。

此书另一值得提点之处是最后一章对“子在齐闻《韶》”典故注解的历代梳理。今人解读“子在齐闻《韶》”章,多主“赞美说”,即认为孔子“三月不知肉味”是因为沉浸音乐之美。但通过对历代《论语》注在该处相关注解的梳理,作者指出,“赞美说”的流行实由宋代朱熹的集注助推而成。在此之前,古人实有的“赞美说”和“伤心说”两种看法。汉人注解偏重“赞美说”,但在魏晋南北朝《论语》注疏界所流行的却是“伤心说”,也即齐侯奏《韶》实乃僭越天子之礼,孔子有感于“礼崩乐坏”而伤心,故致食肉忘味。宋代以前两种说法相互竞争,有一定的均衡之势,但在程朱注解流行后,“赞美说”占据主

流,“伤心说”这一独特又不乏合法依据的见解逐渐被遗忘。这一注解历程的梳理,既展示《论语》注传播过程中不同话语力量的竞争,又提醒今人魏晋南北朝《论语》注存在不少独到创见,由于种种原因而被埋没,但值得再次从有限材料之中将其发掘出来。

当然,书中某些细节的观点还有可商榷的余地。比如该书在分析王弼《论语释疑》时认为,王弼以老子为圣人,高于孔子。这一观点与目前认为王弼以孔子为圣人的主流看法不同。

此书对魏晋南北朝《论语》注中关键问题的辑佚文本,进行了全面而详尽的梳理、归类和分,并且作者善于结合思想史进行分析,将相关研讨深化推进。在很大程度上,该书还为玄学注《论语》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当代的经典诠释以义理发微为宗,始终考虑如何综合古今中西不同的理解视角,充分发挥其对当代生活的意义。而在可以资用的中国古代义理资源上,魏晋时代的玄学注《论语》是仅次于宋学注《论语》的另一重要视角,其所拥有的儒道综合之开放视野、独特的问题意识,以及“得意忘言”的诠释方法,无不对当下理解《论语》具有重要启发。王云飞此书已将玄学注《论语》的具体局面打开,不难想象,后学如若借鉴该书的成果,必然可有所作为。



《穿左门走直道》

□白羽洁

塘栖是江南十大名镇之一,《鹊桥仙》(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讲述了塘栖镇的“小世界”。作者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陈易知、何易从、靳天、戴正等一批儿时同伴讲起,从少年讲到中年再回忆起少年,模糊掉明确的时间线,今夕叠映,踏入时空的“虫洞”,三线交织映照,共同构成萧耳笔下的江南和背后的大时代。清淡雅致的家常气、被淡化的冲突和故事线,江南文学的独特韵味,引领读者细细品读身边人、事、时、世的更迭变幻。

为什么题名“鹊桥仙”?“桥”是重要的意象,不论读者是否熟悉江南,但一闭眼,脑海中不由自主浮现出的就是小桥流水人家,孩子们在桥上跑跑跳跳,情侣手牵着手漫步在桥头,老房子映在澄澈的河水中,江南小镇的味道就这样涌现。“鹊桥仙”首先是词牌名,与“鹊桥相会”的神话有关,爱情是小说中表现人物生存状态很重要的一枚棋子,不同人对待爱情的不同态度被“仙”字盘活,又俗又仙,既指小镇也指人,有人永远高洁地守着自己的心愿,也有人为了目的放弃最初自我。“鹊桥仙”托起了主角代人的状态和浮在生存之上的东西,从“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当易易从这一代人回望渡桥,却已无路,只能在回忆中重温伤痛和情谊。如果“鹊桥仙”给小说定了基调,那散落在文中的诗词便与它同奏共登,诗构成画,画谱写诗,诗词造就萧耳笔下独特的江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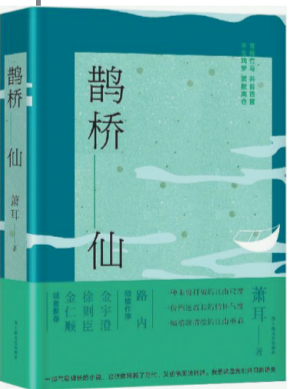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诗词抒写着乡愁,恰因昔日生活变得触不可及,物是人非,人才无比怀念过去。小说中戴正、陈易知、何易从几人多年后重聚,在塘栖聊到阿德师傅烧的片儿川、油条、糖吞蛋,聊到熟悉的已不复存在的地标,最后从“长相思”想到《诗经》,没有人刻意提起离愁别绪,但是诗词使得朋友间原本闲适的对话多了几分伤感。何易从是故事着墨最多的人物,他一步步从小镇到省城,再从省城到首都,然后又从首都回到小镇。诗词是他怀念故乡小镇的一颗纽扣,用“望美人兮天一方”给女儿起名字,用“载驰驱驱,聊以忘忧”给儿子取名字,诗词中包含他的乡愁与他面对更替的无可奈何。这是他的寄托,也是按部就班生活的陈易知、最终选择讲书的戴正的寄托。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诗词展现出情谊与遗憾——一种无可奈何的宿命感不仅包裹着每个人,也揪着读者的心。作品中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变化通过诗词表达,并且从中能感受到人物的不同特质。戴正洒脱逍遥,靳天、陆韶有一股“壮气”,何易从、陈易知二位一体构成作者心中的江南文人。诗词中有着无限对故乡的怀念与深情,明明每一步都没有走错,但是成长带来的遗憾却无法弥补;明明彼此情谊依旧,但被时空阻隔,重逢的日子难如登天。短暂爱情里的遗憾、大时代背景下身不由己的遗憾、故乡味儿不再的遗憾、情谊转淡的遗憾都嵌在诗里,悄悄浮现。

“客舟夜泊塘西浦,灯火几家犹未眠。姹女谁家淮上宅,小儿唱歌何处船。”诗词凸显江南文学之韵味——平缓松弛没有绝对故事中心和冲突点的叙述,让读者始终像和同伴唠家常一样,怀着放松的心情阅读这篇气息绵长的小说。故事中穿插着独特的江南水乡腔调,如“孃孃”“荡荡荡荡”“白相”等,这就使得我们犹如置身同样情境中。富有古典意味的诗词帮助读者形成一个地方的初印象,这是跨越时空了解文化的过程,诗词又将人带入情境,在相互交流中流露出的水乡腔调无形增添了江南本身的气韵和特色。

诗词是引子,为读者打开一扇了解江南的窗口并提供一种引起共鸣的方式,甚至生发出一种独特的江南文化哲学。看着塘栖从最初完全自然的气质随着码头的凋敝发生改变,诗词意境的沉重对应人物对昔日故乡的否定过程,令人唏嘘。因此《鹊桥仙》串联起故事中的江南韵味,回顾塘栖小镇的文化更迭,令江南之美化作标本沉淀在每个人心中。

有些故事注定只有在某个地方才能发生,读罢《鹊桥仙》,令人难以割舍的不仅是一句句意蕴绵远的诗词,更有那些让诗词有了色彩的人和事。柳歇亭茶书场,戴正一袭灰白长衫,脚踩布鞋,清清嗓子继续讲《鹊桥仙》。终是一语成讫,他的书中人,一个也不会留下,都变成了小镇客人。



《鹊桥仙》

关于精神,关于救赎

□胡永良

读当代小说家、鲁迅文学奖得主李浩的中篇小说精选集《乡村诗人札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可以看到,中篇小说完全能够穿透所谓的“故事”,直抵时代的精神处境。正如篇名中借用“札记”一样,李浩在他的诸多中篇小说中都故意将“故事”揉碎,将原本线性发生的“故事”变成时间与空间的混沌体。这种混沌体的繁复性,使它具备世界性“故事”更丰富的意味性指向性。

在这里,李浩让它指向了时代的精神处境,指向了心灵的救赎。童年伴随着呵斥、责骂和常常不期而来的暴力,加上自己“捡来的”身世被暴露,刘义超已无可挽回地受到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当青春期的叛逆意识得以增长,刘义超的反抗终于在父亲刘建亮醉酒酣睡的一个夜晚爆发了。从此,父亲成了他随时可以拿捏与报复的对象,他自己则成为当地臭名昭著的地痞。父亲其实也是可怜之人,他没有妻子,在村里不受待见,酗酒、打儿子似乎是他存在感的唯一表达。《故,事》里这样一种没有血缘关系的特殊父子,经受不住生活的磨折。父亲将生活带给他“恶”无端地传给了儿子,而儿子又将这份“恶”传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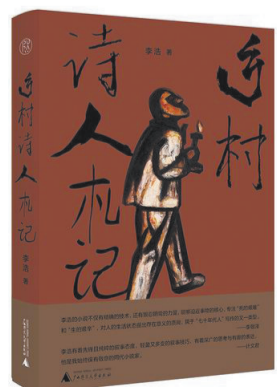
社会,并重重地反射在父亲身上。小说的最后,在等待审判的日子里,人口声声巴不得儿子被枪毙的刘建亮,趁天擦黑悄悄地向县城为儿子送去被子。在这里,我们分明能感到,尽管儿子对他无恶不作,但他心中的善念并没有完全熄灭。

而《乡村诗人札记》中的父亲,作为一个乡村诗人,面对的则是另一种精神的困守与突围。一个阳春白雪、精神高蹈的诗人,落入骨感、世俗、狡黠、混杂的世俗世界,乡村环境与诗人性格之间的巨大落差,构成了小说本身强大的张力。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精神至上的时代,诗歌与抒情占据了精神生活的至高点,“我的父亲”无疑得到了那个时代精神的濡染。他身在乡村小学,精神世界却在县里,在诗里。“父亲”坚持在本不适合诗人生长的土壤上扎根,注定了他要面对种种嘲弄,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捉襟见肘,面对市侩规则对他的不断侵蚀与挤压。尽管“我的父亲”在县报上发表过两首诗,但他仍是被重压的现实所包围,最终,放弃了写诗,进入了麻将室。这是一种精神

的死亡。他最后用写春联的毛笔在红纸上写下最后一首诗,然后又独自静静地用墨汁将红纸一点一点涂成了黑纸。诗人“父亲”在乡村的水土不服,无疑是八十年代的狂飙精神在九十年代商品经济大潮下的命运写照。《乡村诗人札记》戏拟诗歌的结构,固执地以“我的父亲,李老师,是一个乡村诗人”作为每节的开头,在重复反复中构成一种诗的节奏与意蕴,既与小说主题相呼应,又与主人公内心世界相映衬,同时也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反讽的意味。

这种精神与现实间的纠缠、扭打,是李浩小说中隐时现的一种景观。

《藏匿的鸦片》中的菌子,则时时感到周围人、事、环境对他精神的侵蚀。丈夫的不忠,每天在药房接触到患者、同事的爱情悲剧,让她陷入一种如梦似幻的恍惚。她小心地维持着精神世界与眼前现实之间的平衡,企望自己从这个世界抽身藏起来。当同事于燕自杀的消息传来时,她勉强维持的精神与现实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平心而论,菌子其实有一颗强大的心,她一直在对自己进行极力营救,



《乡村诗人札记》

——读李浩中篇小说集《乡村诗人札记》